

## 冀南平原的“四·二九”

冀南军区参谋处长王蕴瑞写的《“四·二九”的前前后后》一文，开头一句话是：“在冀南平原抗日的两千多个日日夜夜，1942年4月29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作者的感受，我想是说出了所有在冀南平原经历了“四·二九”日军“铁壁合围”的人们的共同感受。与“四·二九”紧相连接的是日军对太行根据地5月大“扫荡”，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指挥战斗中牺牲。

环境一天天困难，冀南领导机关人员再次紧缩。任仲夷担任政治学校校长，他要我去任专职教员，时间大概在4月初。不足200人的政治学校，行军宿营不再与行署在一起，改为我们并不熟悉的新七旅指挥。三天两头传来平汉路、德石路等处敌人增兵的消息，上级要求大家克服麻痹思想，尽量轻装。我与另一位专职教员杨清华（那时她叫陈毅）合用一匹马，一名勤务员。各人行李都很简单，一铺一盖，加上几件衣服而已。但我随身携带的二三十本书，现在成了累赘，不像以前一人用一匹马方便了。那些书中有苏联哲学家米丁等人的哲学著作译本，李达社会学大纲，郭沫若、吕振羽、日本人佐野袈裟美等人关于中国

古代社会的书，延安出版的那时不知道何人编著的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史以及若干本马列著作等。它们是我多方搜集的，生怕散失。在风声鹤唳中让马驮上这些“不急之物”游行，可能给活动带来掣肘。4月29日前一天，夜间行军，宿营很晚。我决心第二天头一件事，是从马搭中取出那些书，找个稳妥的地方隐藏起来。

我麻痹大意，第二天一觉睡到天光大亮。杨清华推门进来，叫“大年，还不起来，机枪响了。”我问枪声有多远，哪个方向，她说“五里路，西北边”。大家每天都听到枪响，声音远近一般能够判断。五里地，我认为还不用急。勤务员从伙房端来半瓦盆红薯稀粥。我刚喝了一口，哨音紧急集合。勤务员在街头看了一下，急忙跑进来说，快！校部都走了。我们住在村西北角，正当敌人奔袭的前沿。我来不及把被子塞进马搭，折叠了一下，连同清华的行李紧勒在马背上，拉起缰绳就走。学校大部分人已经离开村子，走出一二百米。时间是早晨7点来钟。那批书仍然在马搭里鼓鼓囊囊。

队伍向南急速行进。这里是河北故城县、山东武城县自北而南一个空隙很小的地带。东面挨近卫河敌人封锁线，西边南宫县日军据点密布，只有南北几十华里可以游动，而且要避免白天行军。半上午以后开始走走停停，显然是敌情不明，要等待旅指挥部通知。路上本地机关团体人员与部分逃离村庄的群众混合在一起。人们并不都朝一个方向走，而是照自己对敌情的了解或南或北。这显示出

周围的情况都吃紧。迎面遇到一支战斗部队，由南而北。彼此都用诧异的目光看待对方，意思是你们怎么往敌人活动的地方去！更不祥的是明明南北都有敌情，却不闻枪炮声。往前穿过一个镇子的南北街，各家门户紧闭。靠近街中心十字路口，有人在那里张望。我们问：今天这里有什么事吗？张望的人神秘地用手指指西边说，村外就是日本兵，天不亮到的，一直没有动。多路分进合击，寻找打击目标，是敌人“扫荡”惯伎。现在明明知道我们就在它眼皮底下，纹丝不动，这种阵势头一次碰到。

新七旅指挥部跟上级机关相去其实并不远。军区、行署、区党委活动范围是比较大的，现在都聚集在这狭窄的地带里。它们同样是早晨发现敌情，马上转移。别处堵塞不通，在一个叫十二里庄的村子里停下来，等待各路侦察员紧急报告情况。“十二里”是指与东面武城县街的距离。武城县境以前我在行军中不止一次到过。有时还想起六七岁时念《论语》，书上那个与武城相连的家喻户晓的故事。孔子的学生子游作武城宰，孔子游学到此地，“闻弦歌之声”。孔子又赞赏，又以为大可不必地说：“割鸡焉用牛刀”。可是谁会想到，此地有一天竟然成了日军“铁壁合围”的中心！数千名抵抗入侵之敌的军民，在敌我力量对比异常悬殊的形势下，面临被歼灭的严重危险，必须在这里突出重围。

当政治学校全体来到十二里庄的时候，村北一片树林里早已挤满了人。党政军领导机关、军区警卫团和骑兵

团、新七旅指挥部和所属两个团的各一部分、本地机关团体工作人员等都在其中。人数估计不下三四千。骑兵团有马约500匹。我方以往一向消息灵通，因为凡敌人据点所在，就是我方搜集情报，对敌工作站所在，这回例外。头天晚上，侦察员汇报说：周围敌人据点“无异常活动”。事后知道，这是敌人周密策划的一次大规模的拉网围歼阴谋。北起德石铁路，南至邢台济南公路，西起某处，东至卫河，日军出动二个师团、三个旅团各一部及众多伪军，共三万余人。庞大敌群在临清、武城分别构筑了两个合围圈。武城地区是其重点，日军主力先在很远的地方秘密集结，并散布假情报迷惑我军。然后突然远距离快速运动，一夜之间，进到层层封锁线与预定合围的位置。敌人企图运用这种战术，令它的对手插翅难飞，聚而歼之。头天晚上我方侦察的周围据点“无异常活动”，实际上正是敌人大动作的异常活动。

军区领导人陈再道、宋任穷这时不在冀南。参谋长范朝利、政治部主任刘志坚是现场最高指挥员。中午时分，敌人从西、北两面逼近十二里庄。范朝利召开紧急会，简短宣布：我们已经被敌人四而包围，马上突围。骑兵团朝西北方向往外冲，各单位骑马的人一律跟骑兵团走；军区警卫团、七旅部队朝西南方向往外冲，各单位所有步行的人跟警卫团走。立刻行动。我对杨清华说，你骑马走，我步行。骑兵团刚刚冲出十二里庄西北，预伏在那里的敌人机枪、小炮劈头盖脑一阵猛烈射击。受惊的马匹失去控

驭，掉回头奔向还没有来得及走出树林的人群。各单位一直保持的编队顿时大乱，在道路和田野上散开。村北、村东同时响起密密麻麻的枪声。敌人便衣也很快渗入我们中间，接连打冷枪。又刮来大风，卷起黄尘飞扬旋转。就在这时，两架敌机出现在头顶上，低空轰鸣，疯狂扫射。刹那间，草木颤抖，天日无光，上下左右，杀气笼罩。我们没有能够从西北方向突围出去。一些人受伤牺牲。

我早起喝了一口稀粥，多半天坚持忍着口渴。在跟随众人移动中，见路旁有个像茶水铺的小土屋，房檐下放个水缸。我向屋门口的一位老妪说，“我喝口水”。她连忙递给我一个瓢。哪知开头一两口水硬是咽不下去。原来是多半天走动，张嘴呼吸，喉咙塞满了尘土。敌机正从房顶上呼啸掠过，身后射来的子弹在近处爆炸。老妪口中连连念：“天老爷，善过！天老爷，善过！”我不懂“善过”是什么意思。她知道这是八路军与无辜百姓遭到了日军的凶杀围剿。大概是祈求“天老爷”让中国人少受些灾难吧！当地群众语言我基本能够听明白。唯有“善过”这个字音多年来一直引起我的琢磨。

步行人群往西南走。战斗部队们行动快，在前面开路。时间不长，南边西边枪炮声又作，越来越猛烈。步行的人大批向东涌动。我们朝西南方向也没有很快冲出去。我跟警卫团向西走，跟到了这里，又随涌动的人群往东，并不知道从此便与战斗部队脱离了。

东面是武城县卫河封锁线。大批人所以往那里走去，

是其他三面被围堵住，唯独东面没有枪声。大家在一望无垠、光秃秃的田野间，毫无遮挡。又要躲避敌机的扫射，又要注意正在封锁南北两面村庄和道路的敌人的行动。一时快跑一阵，一时来回打转。谁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更不知道前面是否会撞上敌人。众人中大多数徒手，也有被冲散了的带武器的战士。党政机关人员早已改穿便衣，作战部队正赶上冬、夏服装换季，新旧不一。我与随同军区政治部突围的日本士兵反战同盟成员碰到了一起。他们七个人，我认识其中两人。他们装束整齐，崭新的夏季草绿色军服，手里拿些印刷品和包裹。在便衣人群中目标显著。这时可能到了下午两点来钟，我们走在一块铁犁翻过的地里，背后忽然有人说：“喂，你看左后方是不是敌人？”左边一条东西路，十来个人，与我们相距约二百米。草绿色服装，一人骑马，步行的人枪扛在肩上正朝东走。我看是日本兵，随口说了一句：“管他妈的！”话音刚落，一排枪射来，子弹在耳边嗤嗤穿过，脚边土块乱飞。反战同盟成员迅速卧倒在地，往前翻滚。我和后面的人也弯腰疾行，但与反战同盟士兵已经分开。不知道在田野里穿行了多远，进入一个镇子的街口。一些人进街往东走，更多的人从街口两侧民宅里找水喝。顺街往东的人很快纷纷回来，摇手表示那里不能去。所有的人又急忙掉头往西，也没有人想打问究竟。

走出镇子没有多久，北面一股敌人逼近，在相距只有百把米的地方对我们射击。敌人的便衣跟我们混到了一

起。奔波疲劳，长时间注视敌人行动，我本来有点麻木了。这时精神猛然振奋起来。举起我那只实际上只可以演节目当道具的手枪，高喊一声：“有枪的打呀！”谁知这一声喊产生了就像是战场命令的效果，田野间顿时爆发出一阵愤怒的喊“打”声和对敌人射击的枪声。带武器的人远比最初看到的要多，有蹲下来瞄准敌人射击的，有边打边走的。我和三四人在两个坟头畔趴下，其中一人是机枪手。他打了三两个连发，子弹就光了。喊打声和我们的还击虽然持续不过三五分钟，大概也有点出乎敌人意料。我们很快知道，一些人闯进去的小镇是武城县的河西街，街东头是防守卫河渡口的碉堡。敌人以为这里是他们盘踞的牢固窝点，所以没有在街西口一带布置兵力。否则我们这许多人恐怕难以有几个生还。

人群翻回往西。估计走了四五华里，前面出现大块麦田，青色伸向远处。回头一看，我成了人群中走在最后的几个。前面本来众多的人，这时也逐渐减少，而且转眼之间，几乎看不到人影了。我在麦田里走了一段，找个不太潮湿的地垄歇下来。麦子刚高过膝盖，为避免暴露，只能在垄间躺下。麦田至北面村庄一华里多，至南面村庄二华里多。南、北村庄都驻扎着敌人，岗哨游动，马匹来往看得一清二楚。不多时，发现麦田里我前后左右都躺着人。彼此低声招呼，并且马上分工，谁注意北边敌人行动，谁看住南边。我身边除一件夹袍，一支手枪外，还有一个缴获的日本军用皮包。里面没有什么文件，但有在抗大朱总

司令亲笔给写的“坚持抗战”笔记本、抗大毕业证书、杨秀峰签署的任命为宣传科长的委任状和一方在长沙购置的鸡血红印章。为应付不测，清除“抗日分子”的证据，现在只有咬咬牙把它们埋在麦田里。不能坐起来挖土，用脚在麦垄间蹬出一个坑埋上。夹袍不是“犯禁”物。手枪修理过几次，不一定能打响，也只有三四粒子弹，它必须留下，差不多是最后的依靠。这时快近半下午。西边较远的地方传来密集的机枪、小炮声，是双方激烈交火。停了一阵，枪炮声再起，但在更远的地方了。可以肯定，这是作战部队突围出去了。我们面前的敌人没有动。我们疲劳，敌人似乎更疲劳。他们从昨天夜间开始远距离行军，一般是今天中午到达指定地点。只要不碰上我们的抗击，他们就是休息待命。我们暂时没有被发现，唯一要做的就是密切注视周围情况，熬时间。

战场上什么怪事也有，忽然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险情。早晨紧急集合，我把被子勒在马背上。我的被面是不久以前花两元钱从贸易局缴获的敌人物资中买来的白底蓝花细布，看上去格外显眼。十二里庄突围时，杨清华骑马走了。现在这匹马驮着原封不动的行李，突然出现在麦田里，站在距我不过四五十米的地点。清华丢了马，人怎么样了？马站在麦田，很可能招引村里敌人来捉马。我们这些卧倒在麦田中的人会被发现。这太危险了。想把马驱赶走，但也找不到办法。马站在那里不动，也不见敌人来捉。时间和空气就像是凝固起来了。北边村庄忽然响起呼



唤似的马嘶鸣。麦田里我们这匹马闻风答话，长嘶两声，扬鬣向村庄跑去。戏剧般地出现的危险，又戏剧般地化解了。照这个情形判断，敌人今天来麦田打扫战场的可能性很小。等到天黑，我们冲出敌人的包围圈毫无问题。

4月底，是旧历3月中旬。落日余晖未尽，皓月已经在东方升起。开头月光明亮，不久被云层遮掩，夜色昏暗。我站起来小声说：“走”。前后左右的人没有谁答话，都站起来在麦田里一直往西。越走人越多，大家心里全明白，什么也不用说。后来一连发现几名伤员，马上有人自动出来架起他们走。只有一次有人喊：“同志，不要丢掉我。”大概是他伤势重，别人也没有发现。麦田中遇到一口水井，大家口渴，要求停下来喝点水，没有桶，有战士解下绑腿系上茶缸往上提，费时又不济事。忽而听人说，伤兵不能喝水，那会增加出血。我抓紧点了点人数，共八十二三人。其中多数是战士和本地工作人员。战士携步枪十余支，轻机枪二挺。我认识的水原健次等三名反战同盟成员也在其内。我估计此地当在北线敌人占据的村庄以西三四华里。敌人的联系巡逻刚过去，这是脱离敌人包围圈最好的地点、时间。我问大家：你们中间有负责干部吗？一人回答：我是军区警卫团营长。我说此地决不能久停，必须赶紧离开。你负责断后，我在前面开路，迅速把所有人带出去。他同意。也不容许商量讨论，什么宣传鼓动也都是多余的。我只低声简单交代了几句：这里是敌人包围的黑暗地区，越过封锁线就是光明。同志们互相帮助。伤

员、武器一定要带走！不能丢。口渴忍耐一下，出了包围圈不怕没有水喝。立刻行动。没有等走出麦田，又加进了十余人，共近一百人。

四名持枪的战士走在前面，侦察警戒。我和三名反战同盟日本士兵走在一起。伤员留下的三支步枪，给他们两支，我拿一支。其他人走在我们后面几十米。封锁线轻而易举穿过了。顺路往西北走到头一个村庄，四名战士进村侦察，没有异常情况。后面的人都进村，稍事休息。负责照顾伤员的人不用吩咐，各自去向住户敲门，安置伤员。这里恐怕要算敌人的“治安区”，我们不敢耽搁，急速向西北走，也就是白天敌人朝我合围的方向。一百来人中，除了一位营长，我算是比较负责的干部。如今大家脱离了眼前危险，伤员也暂时得到安置，武器也带出来了，我当然感到轻松。但是对于三名日本反战同盟成员，我必须把他们安全带到领导机关去。敌人调集重兵，没有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必定不会罢休，因此，心头并没有一块石头落地。

大概已经过了后半夜，天空云层消散，月光不再朦胧。一百来人走在一路，目标太大。在一个路口休息，我跟大家说明这个意思，请军区营长带领战士和武器回部队，本地区工作人员情况熟悉，分头去找自己的单位。这时忽然发现政治学校教务主任丁哲民和一名勤务员也在人群中。丁腿瘸、眼近视，主要靠小勤务员带路。教务处本来是有马的，马在突围中也惊跑了。丁和勤务员是我们在

麦田中往北穿行的时候加进来的。我走在前头，所以谁也没有看见谁。众人分开了，我和丁二人加上三名反战同盟士兵，六个人的小分队，我成了“小队长”，也不需要选举投票。

我们碰到村庄就绕行，一直默默往前走。这十几个小时对神经的刺激太强烈了。我想找到一个扼要的说法表述出来，总不如意。这时头脑渐冷，终于冒出了一个想法：“力量上弱，精神上强”。我们长时间在敌人碉堡林立的空隙中斗争、生存，对于敌人大小规模的“扫荡”司空见惯。但这一次毕竟不一样。十多个小时里，三四千人，在方圆仅仅几华里的包围圈中，面对敌人千军万马，情况瞬息变化，生死成败间不容发。我们只要大多数人突出重围，敌人精心策划的这次大行动就是失败的。现场上，人们表现出的精神，是面对强敌无所畏惧；是被打回或打散了再集合起来闯出去；是对胜利有信心；是沉毅坚定，不怕牺牲，压不垮，顶得住。归根到底，这也就是中国人民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坚持抗日战争的共同精神！我想如果某位名家高手把今天的场面用诗歌写出来，一定是感人的。不过这不容易。

三十多年后，我读到一部唐诗选本，其中有张巡《守睢阳作》一首，不禁马上联想到武城突围的往事。

张巡这位历史人物，是我念私塾时读文天祥《正气歌》上的“为张睢阳齿”时知道的。那时只看过《通鉴纪事本末》上关于这位英雄人物的生动纪述。他坚守河南睢

阳，抗击席卷黄河南北，气焰嚣张的安禄山贼军。他报告唐君主说：“臣被围47日，凡1800余战。当臣效命之时，是贼灭亡之日”。《守睢阳作》就是被围困非常危险的时候写的：“春末接战苦，孤城日渐危。合围侷月晕，分守若鱼丽。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短短数行，惊心动魄，生气虎虎。诗中“合围侷月晕（形容敌人包围严密，像月亮外面的晕圈，“鱼丽”是古代作战的阵名）”，“屡厌黄尘起”，“裹伤犹出阵，饮血更登陴，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不但与发生在武城的战事情景相似，展现的思想意志也相仿佛。六人小分队在夜间默默地往前走的时候，我想要找到的东西，几十年以后，觉得在《守睢阳作》里传来了回响，感叹多时，反复咏诵！

4月底，天亮得很早。我们只知道是在南北狭窄的小条里，地点敌情一概不明。等村中农民出来，了解到敌人昨天从这里来回经过，没有占据。我们进到一个较大的村庄停下，在农民家里吃饭。在此以前，也不怎么感到饥饿。村庄正当过往大道，我们必须尽快转移。动身时，水原健次交给我一包印刷品、好像还有写成的标语之类。意思是要我决定怎么处理。昨天以来，他们经历的危险至少跟我们一样。这些东西本来随手可以扔掉，他们没有那样做。可见日本兵不但战术训练很严，纪律训练也很严格。这些印刷品未必有多大机密。农民院子堆满秫秫杆，我接

过来塞进秫秫杆堆里，就离开了村子。

河北南部有一条（或两条）自南而北的黄河故道，或者沙丘起伏，或者宽阔干涸的河床深深凹进地面。河床中常常能够见到农民熬制土盐堆起的土垒，有像小土屋残垣断壁的。我们找到一处认为地点机动的土垒隐蔽休息。三名反战同盟士兵看来情绪稳定，他们彼此也不交谈。我只是用手指比成“八字”形，向西北方向指指说：“八路大大的有”。现在想起来，这好像是讲儿童故事。多半天没有听到枪声。先后有两支日军在与我们相距约200米处穿过河床。最前面的人用长竹竿挑着太阳旗，更前面是几条寻找猎物的狼犬，没有发现我们隐蔽的地方。太阳西沉，估计敌人的行动已经过去，我们来到河西边一个村庄找到村干部，安排在一户农民家里弄点吃的。又凉又硬的高粱窝头，蝇子在饭筐上飞舞。这是长期艰苦生活、又饱受敌人摧残的农民群众能够拿出的最好的东西。天还不黑，军区宣传部长白文华（50年代担任过总政秘书长）独自一人，从村东口走进来，显然跟我们的经历也差不多。我头一句话就是问，是否知道军区在哪里？三名反战同盟战士我想最好他带走。他说军区大概在枣强东部一带，反战同盟三人由他接收过去。我从武城麦田出来到现在，肩上的负担解除了。怎么也没有想到，事情还留下了一个小小尾巴。

1945年10月我从太行山回到冀南行署，军区与行署同住在威县城里。军区敌工部长张有萱（张茂林）在一次

见面中，他郑重地问：水原说，“四·二九”时他把一包文件交给你了，你能记得放在什么地方吗？我似乎感到惊讶，告诉他水原是把一包东西交给我了，当时藏在一家农民的秫秫堆里。不但记不起村庄名称和农家的位置，就算能记起，事隔几年，什么文件早该化成灰烬了，还从哪里去找？自那以后，与张没有再见，只知道“文革”前他是国家科委副主任。前几年，我到协和医院治牙。在我前面做牙的一位老同志觉得在哪里见过，一问才知道是张有萱，彼此交谈起来。抗战前他是留日学工科的，“文革”后，先后在几个工业部任副部长。已经离休，我没有记住他最后在哪个部。

武城突围以后三四天，我与任仲夷、杨清华等在枣强地区行署会合，牺牲和失踪者的名字陆续传来。其中有行署文教处科员庞明辉、通讯员小吴、教材编审委员会负责人王化民。他们都是长时间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庞冀中束鹿人，是中学毕业不久的青年。工作细心负责。十二里庄突围时他跟在骑兵团后面被冲散了。我碰见他和小吴拉两匹马在路边两棵杨树下躲避敌机。我要他放开马，人先走。他指指马搭说，有文件，马不能放。敌机低空盘旋，树下马匹很容易被发现。结果两人一同牺牲在敌人的炸弹下。小吴是行署受人夸赞的“小鬼”，以为他未来可能成为军队的指挥员。他头脑机灵，一切都是主动去干，不知疲劳。牺牲时不过十五六岁。王化民河北临城人，“七·七”前当中学教员。一条腿受重伤，农民从麦田中背出。

他与一位江姓女同志彼此有意，从未明言。受伤后江赶去护理，怀着爱情和对敌人的仇恨，坦然表示：你只要活下来，我们就结婚，没有腿，我照顾你一辈子。因缺少医药，王无救身亡。后来听说，武城突围，牺牲干部、战士200余人，各村群众遭屠杀又200余人。当地现在竖有一座抗战胜利后修建的烈士纪念碑。